

刘 靓

“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西安的高校因地下众多的考古文物发掘出土，被戏称为“古墓派”。众所周知，居住在常乐坊东亭、写下千古奇文《养竹记》的秘书省校书郎白居易，家在蛤蟆陵下住的琵琶女是交大人多年的邻居。除却兴庆、雁塔、曲江、西部创新港四校区占地约5000亩的地表建筑群外，地下还共栖着一个丰沛浩大的文明世界。六十余年前，首批西迁拓荒人选择了北接“代邸青门右，离宫紫陌随。庭如过沛日，水若渡江时”的兴庆宫遗址、南邻“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乐游原、中藏“曲罢常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的蛤蟆陵道政、常乐二坊旧址，当年长安城的宫阙万间、车骑如云早已化作荠麦青青，瑰奇的汉赋与刚健的唐诗虽已化作碑石上的篆刻，但大唐精神内在的神与魂却自下而上地旋转升腾，让穿梭于实验室、奔波于求职季的交大学子有了一片俯瞰“吾生之须臾”、仰观“宇宙之无穷”的精神天空，实现了古今内外的共生共栖。

1987年，西汉宣元时期的墓葬壁画出土，栩栩如生的流云仙鹤、“朱雀玄武青龙

白虎”四神与二十八星宿图，彰显了西汉“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的天人同构思想。此后，汉代的长生未央砖、昭明铜镜，唐代鎏金镂空银香薰、鹿纹十二瓣银碗、玉花簪头从黑暗的土壤中苏醒，诉说着风沙挥不去的历史血痕，黄沙吹不老者的忧思难忘。如今这些沉睡千载的岁月使者得以重见阳光，隔着博物馆的玻璃展柜与后人平等对话，打破了现代生活与历史沉淀存在割裂的刻板印象，让历史成为于人生百态中窥见世道人心、于万象流变中觅得永恒规律的湛湛明镜。

校园北面的兴庆宫公园是古老传说与人间烟火紧密结合的典范。这座由游赏离宫到唐帝国政治枢纽，与大明、太极两宫并驾齐驱的宫殿群，以“龙池”与“兴庆殿”作为前后中心，以大同门、瀛洲门、仙灵门为隔断，北面有大同殿、南薰殿、新射殿、交泰殿，南面有承庆殿、沉香亭、花萼相辉楼、勤政务本楼，见证了从“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之开元盛世到“宗庙新除狐兔穴，伤心不忍问耆旧”之天宝乱世的岁月沧桑。当时的长安城包罗万象、气魄雄浑，来自异域的景教、祆

教、摩尼教与本土道教、已汉化的佛教和平相处，酒肆中跳着胡旋的胡姬、踏着丝路驼铃而来的大食胡商与曲江池畔流畅吟诗的汉族士大夫、绣罗衣裳照春春的长安丽人在同一个时空域中并行不悖，《婆罗门》曲与宫廷雅乐糅合产生了《霓裳羽衣曲》，形成人类文明史上为数不多的美与共、天下大同之恢弘场面。

千年之后，来自东部沿海的西迁人与本地的工农群众扛起劳动工具，在旧址上建起了亭台楼阁，凿出了一池碧水，让“太液芙蓉未央柳”的池苑、“春风拂槛露华浓”的牡丹穿越漫漫尘埃重回烟火人间。旧时尊卑分明、壁垒重重的宫廷禁苑成了可供大众休憩游览、抚今追昔的人民公园，旧时“一从深花色，十户中人赋”的富贵花成了开在寻常院落的身边风景。不得不说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历史中最为崇高伟大的不是纵横捭阖的王侯将相，也不是绣口吐出盛唐的诗人墨客，而是扛得起锄头、上得了沙场、筑得了官室、织得出绢帛的大唐百姓，他们用春蚕蜡炬般的辛勤劳动为帝国大厦建构了最为稳如磐石的底座，支撑起了一个民族最为辉煌的巅峰时代。同样，西迁进程中

有走在行业前列的精英学者，更有守护绿树成荫的花匠等普通劳动者。他们虽没有直接参与国家重点项目，却能最先发现屋顶哪处漏水、树干哪段生虫、砖石哪处裂缝，为整所校园接着最淳朴的底气、聚着最兴旺的人气、攒着最坚实的底气，为前方科教事业的飞速攀升构筑起了温暖如家的大后方，让束在高阁上的书香气与浸在风雨里的泥土气完成交融与共栖。

史学大师钱穆曾说：“历史不能和时间脱离，时间有过去、现在和未来……若不能与过去、未来相贯通，此项记载亦绝不能称为历史，而且也不能有此项之记载。”从上海人到西安人的转变，除了慢慢吃得惯油泼辣子、喝得惯西凤酒、听得惯吼唱秦腔、枕得惯耀州瓷枕外，还要从知识分子的书斋天地中走出来，在更替兴衰的十三个王朝、七十二座陵阙中读懂这方大地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听到苍凉悲壮的秦腔中渴望重现往昔繁荣的大音希声，看到生于斯长于斯的代代百姓倾其全力支撑血脉的大象无形，触摸到沐浴着新时代光芒蓬勃生长的“继承者们”奋起直追、接续奋斗、闯出未来的大志无言，方能真正意义上和三秦大地命运相系、沉浮与共。

## 文化周刊

在渭北这片辽阔而质朴的土地上，青年男女的婚嫁事宜，堪称一场引人瞩目的盛典。礼仪之周到，遍邀四方宾客，其严谨细致的规程，令人不禁肃然起敬。无论贫富，每当子女联姻，必先至先辈墓前，虔诚跪拜，告知先人将有新成员加入家族之喜，方觉心满意足，然后才开始筹备婚嫁事宜。

谈及青年婚嫁，当事人必然慎重参考老黄历，对人生重要事件深思熟虑、精心安排。挑选吉日良辰，极为讲究。在渭北，每月初及下旬，若逢三、六、九之数，素有“三六九，向上走”之谚语，视为大吉之日。男女双方结亲，崇尚真情相悦，唯有双方真心相爱，方能成就美满姻缘。因此，婚嫁筹备之初，男方若有意愿迎娶佳人，便请媒人前往女家商量，商讨婚嫁事宜。这一过程犹如一场郑重的协商，双方互赠礼物，你来我往，依照传统习俗，审慎讨论女方彩礼之数。直至男方送上彩礼，女方选定吉日，男方心中的忧虑方才消散。

筹备婚礼，对于渭北民众而言，乃人生中的重要庆典，不论富贵之家或是平凡之户，皆高度重视。婚嫁之时，必然广邀邻里亲朋，共同庆祝。尤其在渭北，婚嫁娶的传统习俗别具一格。丧葬之事，众人亲力亲为；而婚礼庆典，则以广纳宾客为首要。因此，主家婚嫁能否顺利举办，与邻里对主

家的态度密切相关。若主家行事果敢、决策明智，诸事往往顺利圆满；反之，若主家处事犹豫不决，则事后难免招致非议。

婚前之夜，男助手们井然有序地搬着桌椅板凳，细心地摆放着；而女乡夫则在厨房内精心洗刷餐具，挑选着新鲜的食材。厨师的手艺如何，乡亲们品尝之后，都会直言不讳地品评一番。此刻，新郎的密友们齐聚洞房，欢声笑语，保持着古老的婚礼习俗；主家则热心地供应饮食，并赠送礼物，以此庆祝这喜悦的时刻。

婚礼之际，晨曦微露，温婉的晨晖轻抚着新娘家的院落。遵循传统礼仪，新娘与伴娘先品尝了母亲亲手煎制的荷包蛋，随即前往影楼精心打扮。迎亲的队伍里，邻里们手捧莲花，昂首而行，莲花寓意着新人携手共进，婚姻幸福美满；“打鸡娃”手托明镜，步履轻快，预示着新人早日添丁进口。

按照传统习俗，迎亲的使者首先在女家品尝佳酿美食，随后便着手搬运嫁妆。

## 关山婚俗

冉学东

在此期间，“打鸡娃”乘机取过厨房里的热馍，尽情享用。女家主试以明镜作为交换，“打鸡娃”机智应对，直至获得满意的红包，方才同意交换。嫁妆装载完毕，鼓乐震天，鞭炮声声响起，新郎轻柔地将新娘抱入花轿，伴娘、伴郎及“打鸡娃”依次登车。

车队缓缓启动，新娘的兄长跨骑骏马，担任着护花使者的重任。一路上，每至坟莹或桥梁，便有纸钱如雪花般飘落，寓意着驱邪避凶，祈求一路平安。行进途中，时有路人拦截婚戏伴娘，此举虽偶有争议，却也平添了婚礼的欢乐气氛。车队到达男方村口时，村里的女性们用红绳横跨道路，迎亲队伍则用水果糖块作为通行证，以此换取一路畅行。

车队缓缓抵达主府门前，众人簇拥着花轿，洋溢着喜悦的气氛。新郎的嫂子不断地抛撒着各色糖果，村里的女人们竞相抢接，现场一片欢腾。待助手与新娘一方交涉完毕，递上红包后，便指挥着众人井

然有序地搬运嫁妆。新郎在邻里乡亲的见证下，庄重地向新娘行过礼，接着轻轻地将她抱进了洞房。

随着婚礼的华丽篇章悄然落下帷幕，证婚人庄严地宣告婚礼的序幕正式开启。女方家族的贵宾们在丰盛的美食中沐浴欢愉，沉浸在这份喜悦之中。新人则在乡邻的引领下，逐一向女方的亲朋好友敬酒，表达崇高的敬意，而他们则用绢作为回馈。这一幕幕礼仪有序，洋溢着温馨与和谐。

随着夜幕低垂，酒宴缓缓落幕，亲朋好友纷纷告别。主人特意准备了热气腾腾的汤品，并赠予答谢之礼。新婚夫妇迎来了他们浪漫温馨的洞房花烛之夜。婚后第二天，新娘的哥哥亲自前来迎接妹妹回家小住，新郎则携带礼物紧随其后。从此，这对小两口携手前行，共同演奏出幸福美满的生活乐章。

渭北平原的婚俗，在时光长河中历练与凝聚，始终如一地传承着古老的习俗。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对新人幸福美满的祝愿，透露出对传统的敬畏与尊崇。它恰似一首绵延不绝的古韵乐章，在人间烟火的交织中低吟吟唱，诉说着世人对真挚情感与美好生活的向往。

民俗



本期编辑:刘诗萌 美编:桂璐 校对:胡建宏



## 探索“驼城”名称的由来

刘满平 旺旺

榆林，有个别具一格的雅称——驼城。当你怀揣着对骆驼的遐想踏入榆林，却惊觉，除了街头那栩栩如生的骆驼雕塑，以及口口相传的神驼故事，现实里竟难以寻觅到骆驼的丝毫踪迹，更不见与之相关的产业。这巨大的反差，不禁让人满心疑惑：一座不见骆驼的城市，缘何被称为“驼城”呢？

关于“驼城”之名的由来，查询给出的解释多数是：因城池东依驼山或驼峰山修筑而得名。然而，当我们深入历史的缝隙，细致研究明清文献的成书时间与内容后，却发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榆林城“驼城”的称谓，真正的源头并非山川，而应是蜿蜒盘旋的长城，确切地说是长城镇北台段。这一称谓，最初是蒙古人对长城的独特称呼，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历史渊源呢？

### 从文献内容分析

明代许论撰《九边图论》：“夫榆林地险而防严，将士敢勇，战不贯骨，虏呼为骆驼城，人马见则畏之。”《九边图论》成书于1538年。

明代严从简撰《殊域周咨录》卷十九：“于是东起清水营之紫城寨，西至宁夏之花马池，延袤二千里，每二三里则为敌台，营寨连比不绝。又于中空筑短墙横一斜二，略如翻月状，以为敌寇避箭之所。凡为堡十二，营寨八百有奇，墩九十有五，两月而功毕。虏过城下者啞指相顾，号为骆驼城……”《殊域周咨录》约成书于明万历二年（1574年）。

申时行与戴阁科的信中说：“三镇中独延绥疲甚，人卫之马还者十无一二，安得不弱？彼孤悬塞外，薪桂米珠，独以土马健斗，虏中有骆驼城之号，故往时谓之雄镇。”申时行（1535—1614年）明代诗人。

明代方孔炤《全边略记》卷五：“勇敢劳于征发，而骆驼城之雄气不无耗衰。”该书成书于崇祯元年（即1628年）。

明朝遗民屈大均《八声甘州榆林吊诸英烈》词：“最好榆林雄镇，似骆驼横卧，人马皆惊。更家家飞将，生长有威名。为黄巾、高膏原野，与玉颜、三万血花腥。忠魂在，愿君为厉，莫逐流萤。榆林镇，流寇号为骆驼城，马见

而畏。”该词创作于明末清初（1630—1696年）。

《明史》卷九十一志第六十七兵三：“至是，子俊乃徙治榆林。由黄甫川西至定边营千二百余里，墩堡相望，横截套口，内复掘山堙谷，日夹道，东抵低头，西终宁固，风土劲悍，将勇士力，北人呼为骆驼城。”《明史》是清顺治二年（1645年）开始编修，乾隆四年（1739年）才完成，前后历时九十四年。

依上文献内容可知，我们认为因明朝余子俊修筑长城，其依山势所构筑的宏大墙体，加之高处的烽火台，在茫茫沙漠中蜿蜒起伏，如在沙漠中行走或静卧的驼队，首尾相连，形似驼峰显露。被常年与军队相伴的蒙古族人民看作酷似由骆驼化身而成；加之守边将士勇猛强悍，与他们心中的骆驼坚毅勇敢的形象不谋而合，于是“骆驼城”“骆驼城到了！”随口呼之而出，“骆驼城”由此流传开来。

从明代文献的记载可以推断，“骆驼城”这一称谓最初源自当时被称作“虏”“流寇”“北人”的蒙古人之口，也就是说，是蒙古人率先喊出了这个名字。加之，明朝时期对骆驼又有特殊的文化内涵，曾多被用于石像生等，是吉祥的象征。所以骆驼城之称也就被当时的榆林人和将士们所默许、接纳，并开始自称、自号。

陈寅恪先生《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一文，通过蒙文本和满文本《蒙古源流》（1662年成书）中记载的“Temegetu”即是延绥镇总兵驻地榆林城。也就是说“Temegetu”是蒙古人对榆林城的称呼，“Temege”在蒙古语中就是指骆驼。“驼城”之名其实主要出现在清代文献之中。

清代谈迁《北游录》中诗云：“榆林健儿敢驰骋。坚城自昔号骆驼。猎猎天狼惊仓猝。西上陇坂落日黄。”该书记录了谈迁在1653年至1656年间赴北京期间的经历见闻及诗文。

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輿记要》：“成化七年，抚臣余子俊言：延庆边山崖高峻。乞役丁夫，依界石一带山势，曲折铲削，令壁立如城，高可二丈五尺。山崩川口，连筑高垣。或掘深堑，相度地形，建立墩墩，添兵防守。此不战而屈人之计。九年，修筑始就……说者谓榆林地险而防严，将士敢勇，战不贯骨，敌每惮之，呼为骆驼城

人马。”该书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成书。

《古今图书集成》榆林卫：“榆林卫城池，唐古胜州地。明正统中，都督王祜建。成化八年，巡抚余子俊增筑北城。周百一十步，高三丈，池深一丈五尺。门七、东二、西四、南一，号为驼城。”该书成书于清雍正六年（1728年）。

雍正《陕西通志》：驼山“一名东山。城半距其巅，高数十丈，俗呼为东山。土人多穴居之，山形类驼，镇之得名驼城”该书成书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所以自清以来，各种史志书籍都认为榆林城称“驼城”是因依驼山而筑得名。时至今日也都依此之说。

《嘉庆重修一统志》陕西榆林府：“驼山，在榆林县治东。高数十丈，城西居其上，俗呼为东山，土人以穴山为居。山之西有堡儿山。”该书成书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记载有“驼山”。

### 从成书时间与历史事件分析

翻阅历史文献，不难发现一段饶有趣味的历史脉络。明宪宗成化十年（1474年），余子俊率领军兵，在原隋长城的根基之上，修筑起榆林段长城。自此以后，“骆驼城”或“驼城”之名，才开始频繁出现在明清时期的历史文献与诗词佳作之中。在明代的文献记载里，多以“骆驼城”的称谓出现，其中对敌方“虏”“流寇”这样的称呼，字里行间都映射出当时紧张的局势和复杂的历史背景，宛如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让人得以一窥往昔的风云变幻。

时光流转至清代，文献之中那些带有强烈对立色彩的字眼已然消失不见。在编纂《明史》时，“北人”这一相对温和的称呼取而代之，这细微的用词变化，彰显出民族矛盾逐渐缓和、消融，社会趋于和谐稳定的景象。从这个侧面来看，明代文献对当时历史的如实记录，其真实性和准确性也得到了有力的佐证，宛如一座坚实的历史坐标，为后人指引着探寻往昔的方向。

在历史文献的长河中，最早出现“骆驼城”之说的，应该是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许论所撰写的《九边图论》。而榆林城的兴建，则始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从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起，直至清同治年间（1862—1875

年），榆林城历经多次扩建、修缮，才逐渐形成规模。自榆林城始建，到“骆驼城”之名在文献中首次出现，中间相隔长达169年，且这一称谓恰恰出现在1474年明长城修筑之后。这一系列的时间节点和历史事件相互呼应，有力地表明，“骆驼城”之说与长城的修筑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

明代赵廷瑞修纂《陕西通志》榆林卫中：“堡儿山在卫内东二里。土山在卫内，高数十丈，居人穴山而居，山上旧有烽燧，后移于此城外半里。”该书成书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

从上述文献不难推断，在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之前，如今被称作驼山的地方，其实另有其名，彼时被唤作土山。说明那个时期，榆林城尚未衍生出驼山与驼城的说法。然而，早在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许论所撰写的《九边图论》里，“骆驼城”的称谓就已经赫然在列。

这一时间线的交错清晰地表明，骆驼城与驼山之间并无渊源，而且这一称谓的形成和榆林城也不存在直接关联。由此可以合理推测，“骆驼城”所指，极有可能就是当时的榆林段长城。它蜿蜒于历史的风沙之中，承载着往昔的记忆，见证着岁月的变迁，静静诉说着那段独特的历史。

### “驼城”之说的形成

笔者以为，“驼城”这一称谓，是“骆驼城”名称在岁月流传中不断流变与演绎的产物。“骆驼城”与“驼城”，皆为民间自发流传的称呼，并非官方所定。当“骆驼城”这一称谓在民间萌生后，在口口相传中简化为“驼城”，也就不足为奇了。

况且，榆林城，是一座与长城血脉相连的城市，它依长城而筑，历史的脉络与长城紧紧交织。追溯往昔，最早的榆林寨专为长城沿线驻军而设，作为长城防御体系的关键节点，不仅是军事防御的重要堡垒，更是长城沿线驻军生活与戍边的核心区域，是长城防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榆林城更是“九边重镇”之一，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长城沿线最大的烽火台——镇北台，巍峨耸立，气势恢宏，被誉为“万里长城第

一雄关”。镇北台，见证着榆林城作为军事要地的重要地位，从这里极目远眺，便能感受到它曾经在边防防御中的关键作用，也足见榆林城地理位置的举足轻重。

榆林古城，曾是长城沿线至关重要的屯兵之所、指挥中枢和后勤补给基地，它与长城防御体系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御网络，是长城防御体系中无法分割的整体。而“驼城”这一别称，正是对这段长城与古城的统称，承载着榆林城独特的历史记忆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是这片土地上历史与文化的生动象征。

加之榆林城三迁的故事，其间还衍生出了动人的“神驼传说”。传说中，为了躲避风沙的肆虐侵蚀，是“神驼”将榆林城驮至此处。如此一来，从“驮城”演变为“驼城”，自然是水到渠成，合乎情理。于是，“驼城”这一饱含韵味、名字，便在民间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榆林城的别称。

明末清初以后，满蒙之间频繁联姻，关系和解。长城区域一跃成为边贸往来的关键枢纽，以及民族融合的重要纽带。在榆林镇北台附近，款贡城、易马城拔地而起，彼时的繁荣景象可见一斑。当时，往来于榆林城的骆驼数以万计，“驼城”之名，实至名归。

综上所述，榆林城“驼城”这一称谓，诞生于民间，传播于民间，成熟于民间，是广大民众对榆林的形象认知、历史记忆以及情感抒发的生动体现。透过对历史文献的严谨考证，我们能够清晰地探寻到“驼城”与长城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无疑是长城文化与榆林地方风情深度融合的璀璨结晶。真相是什么？探索“驼城”名称的由来是在深度挖掘历史文化宝藏，希望广大驼城文化爱好者积极参与进来，共同开启这一寻宝之旅。

时至今日，尽管榆林城中已难觅真实骆驼的踪迹，但“驼城”的名号愈发响亮。驼城不仅与骆驼有关，她还饱含戍边将士英勇的抗争精神，是长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骆驼坚韧不拔的精神与长城雄浑壮阔的精神，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相互交融，不断孕育出崭新的奇迹，最终凝聚成为榆林城蓬勃的“驼城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榆林人奋勇前行。